

论翻译之于中国小说

刘祥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中国翻译史上各个发展阶段中的外汉翻译丰富了汉语语言表达形式,促进了汉语口语化和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为小说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域外小说翻译促进了中国古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使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其主要表现有:小说素材的准备、创作手法的丰富、观念的更新、叙事角度的灵活、体裁的多样化、功能的扩大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域外小说翻译介绍了外国小说作品,展现了外国小说创作的巨大文学成就,孕育、培养了新一代中国小说家,中国小说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 翻译; 小说; 现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1-0095-05

综观中国翻译史,我们发现,翻译从来就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桥梁、文化之间的纽带。中国历代的贤达、先进分子总是将它作为“文化战略考量”的手段^[1],秉承徐光启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思想,介绍引进国外当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念,以达到国强民富、振兴中华之目的。季羨林老先生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国小说能够从“小道”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由不登大雅之堂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逐步发展、壮大,并完成现代转型,成为当今文学四大门类之一,这两次“外来之水”确是功不可没。在翻译的阳光雨露滋润下,中国小说这棵小苗发芽、生长,以至枝繁叶茂、成为参天大树。

一 外汉翻译为中国小说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

“翻译是在语言的平台上进行,大量的翻译必然带来对语言的冲击和改造。……翻译对汉语的发展和白话文的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中国翻译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的外汉翻译丰富了汉语语言表达形式,促进了汉语口语化和由文言向白话的

转变,为小说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

佛经汉译影响了汉字四声、字母和汉语的等韵图表,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为能更加充分地表达佛教义理,在佛经翻译中,汉语中的有些字或借用、或引申,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创造了许多新字,出现了许多新的词语,如汉词佛意、意译词汇、梵汉合璧词和利用新造汉字组成的词^[3]。佛经汉译促使源于佛教的成语和熟语的大量出现^[4]。

佛经汉译也推动了汉语的口语化发展。汉魏六朝时期的佛典中,开始出现“把”、“将”、“着”、“了”、“便”、“就”等构成的新兴语法成分。佛教著作判断句用“是”来承接主宾语。句末不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古汉语中常见的语气词。翻译佛经中也不附合当时流行的骈文家的绮词丽句,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倒装句、提问句以及解释语句。

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重意译,即注重原作思想观念的译介,不在意原文语言形式的表达,对汉语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层面。这时的汉语文言文处于至尊地位,白话文视为鄙俗语言。严复称之为“近世利俗文字”。但随着翻译而来的新字词、新句式大量出现,人们开始相信,这些所谓的“鄙俗语言”,“近世利俗文字”却能得到普通大众的青睐,更能方便、准确地表达原文中的新思想、新观念。这样直译开始取代意译占得上风。袁进考证,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是

[收稿日期] 2012-07-1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音译与音译词的社会接受”资助(编号:2010YBB292)

[作者简介] 刘祥清(1967-),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

1853年士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5]。该小说就是用白话翻译的。之后,傅斯年提出“欧化”,鲁迅主张“硬译”,目的是“借着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造和丰富汉语。这样就导致了欧化白话文的出现和蔓延,加速了汉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王力(1980)^[6]、王克非(2002)^[2]等论证了近代翻译对汉语的深远影响,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方方面面,说明了翻译在汉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过程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后出现的新文学提出了“文学革命”口号,掀起了白话文运动。被公认为新文学运动先声的陈独秀首先提出“文学革命”口号和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主张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1918年5月,鲁迅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向世人宣示了白话文的文学创作价值。白话文的《新青年》和《狂人日记》的榜样作用推动了汉语由文言到白话转变的最终完成。

由翻译引起的汉语由文言到白话的转变,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为重在描写身边“小人物”、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这样的一种文学体裁的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为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普通大众,阅读、欣赏小说提供了方便,也为小说本身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佛经翻译给予了中国小说足够的养分,促进了中国古小说的形成

梁启超在其《佛学研究十八篇》中认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有密切关系。”佛经的翻译与传播为中国文学“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胡适语)。佛经翻译给予了中国小说足够的养分。“佛经翻译文学是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母体’和最强有力的‘催化剂’”,是中国小说的素材库^[7],直接促进了中国小说的形成。

佛教经典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文学作品。佛经用韵文叙述了佛祖释迦牟尼一生的故事,被认为是当时最优秀的叙事诗。佛经利用大量富于哲理、机智和幽默的寓言故事来解释和宣传佛教教义。叙述佛陀生前的传记文学《本生经》和《维摩诘经》就是一部半小说、半戏剧作品。《百喻经》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

佛经中的诵习传统、自由讲说形式和丰富的想象空间突破了中国原有的叙事题材的限制,激发了唐小说和元明时期章回小说的创作。郑振铎认为:“他们是我们的许多最美丽的故事的渊藪,他们是后来的许多小说戏曲所从汲取原料的宝库……有一部分简直已是具备了近代的最完美的短篇小说的条件……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的写作小说的开始。他们是中国短篇小说上的最高的成就的一部分。”潘承玉通过考证,认为佛家论议、说话等宣传方式与唐代民间说唱,共同构成了古代通俗小说的源头^[8]。唐代的志怪小说多记录神鬼灵怪、天堂地狱和因果报应,通过照搬、模仿、改造和演绎等方式取材于佛经翻译文学。唐代传奇小说也是在佛经汉译的影响下得到了长足发展,被认为是“小说体裁之完成,亦开后世小说独立完成之先河”(周潜《论唐代传奇》)。晚唐传奇小说中产生女侠小说。这种小说充满知恩图报思想和神秘色彩,其文化基础就是当时佛道思想的盛行,被看作是后来象《水浒传》和《三侠五义》这类侠义小说的雏形。

佛经“变文”文词大众化,想象力丰富;记叙曲折,文字通顺,情节生动,故事性强,开创了较为自由的新文风,对唐传奇以及后世的小说创作启示很大。出现于宋代的新文学形式话本小说就发端于佛经“变文”。它从口头文学底本整理演变而来,与传统的讲唱学有着直接关系。

被誉为中国神魔小说之首的《西游记》就是以宋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基础演变而来。“从内容上分析,《西游记》所描写的是以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贯穿起来的;从语言上分析,小说中的佛语僧言比比皆是;从题材上分析,小说中的故事绝大多数源自佛经;从人物上分析,唐僧的原形直接取自唐僧玄奘,而孙行者的原形据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陈寅恪先生考证也出自佛典。”^[7]

三 域外小说翻译更新了小说观念,丰富了小说创作手法,使中国小说体裁呈现多样化

中国传统小说,以不奇即怪或亦奇亦怪的故事,“文以载道”,宣扬三纲五常,使读者接受忠奸、善恶、爱憎、信诈等封建道德的教诲与劝戒。这种仅以教诲与劝戒为己任的中国传统小说主题狭隘,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极易蹈入重复与类似的泥坑。因此,集志怪与传奇之大成的《太平广记》及集中国话本小说之精粹的“三言”、“二拍”都给人以千篇一律、重复类同的感觉。中国传统小说的弊端就在于将部分当作全体,束缚了中国小说前进的步

伐。域外小说的陆续引进,使中国传统小说的教诲、劝戒观念受到震动。域外小说感人肺腑的故事情节、博奥深沉的人生意蕴成为中国小说作家仿效的楷模。从此,中国小说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教诲劝戒转向描摹社会人生的广阔图画,创作手法逐步丰富,小说体裁呈现多样化。

中国传统长篇小说,由于巨大惯性,到清末民初,虽难于完全摆脱链条式结构模式,但在西洋小说影响下,章回体的对偶式回目、开头结尾的套语被自由得体的方式所取代,链条所串联的环扣不再牢不可破,其周围也吸附上了与主链有关的附件等。

域外小说翻译对中国短篇小说的影响较为明显。

在域外小说翻译的影响和滋润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一改原来的只有讲史和传奇两种类型、品种单调的局面,呈现品种多样、形式各异的新局面,除引人注目的社会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之外,还有政治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法律小说、历史小说等等。

在域外小说翻译的影响和滋润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以横断面的结构方式取代了原来的那种浓缩了的长篇小说的链条结构。这种结构采用特写镜头方式,截取人生或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断面来表现人物性格、反映社会现实,丰富了表现手法。

在域外小说翻译的影响和滋润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运用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打破了原来那种按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发生的逻辑先后次序连贯叙述的大一统局面。这种倒叙插叙,“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周桂笙语),“命人坠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梁启超语)。这样,“正叙”与“倒叙”、“插叙”交替使用、错落有致编织,使故事情节于平直中见曲折婉转,拓宽了作品表现的时间空间,凸显了短篇小说的丰厚。

在域外小说翻译的影响和滋润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运用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直截了当地剖析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丰富了中国传统小说心理描写方式。

在域外小说翻译的影响和滋润下,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一改全篇全知全能直线型叙事模式,开始出现套叠式第一人称叙事新模式。袁进认为1853年士宾威廉翻译的《天路历程》是这种叙事新模式的开始^[5]。这种叙事角度的改变,给读者以真实感,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能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小说和当时其它体裁文学作品一样,实现了从形式到内容的现代化,

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四 域外小说翻译扩大了中国小说的功能,提升了中国小说的社会地位

中国小说历史悠久。先秦时期的“小说”虽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不完全相同,但因是儒家之外的著述而归为“小道”之列,是“琐屑之言”,是“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不是道术所在,所以不入九流,所以“君子弗为”。小说“迂诞失实”、“无可征信”、“致远恐泥”;至唐以后,更被认为是“于世无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诲淫诲盗”、“宣淫诲诈”;至清代,小说成为“淫词”。康熙说:“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朕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材,是不惟无益而且有害……俱宜严行禁止。”^[9]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受孔子“小道观”的严重束缚,正统的诗文撰述是封建士大夫“不朽之盛事”,而小说创作却被认为是鼠窃狗偷的海淫诲盗之行为。历史上纵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可与任何世界文学名著媲美的巨著,但小说创作一直处于文学的边缘,地位卑下。

先秦以来,小说被认为是经史之附庸,正史之余绪,是拾正史之遗逸,补正史之不足。但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通过羽翼经史,至明代,小说可比于经史,直至远胜三坟五典,并强调小说的传道功能,将小说纳入传道的正途,让封建统治阶级接受,为小说地位的提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明代,将小说比附经史,除了借助经史来提高小说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指出小说与经史之不同,企图摆脱经史的束缚,让小说自成一体,具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努力,虽然依然在“小说即小道”的阴影之下,未能解决小说具有独立的文学地位和价值的问题,但这种可贵的独立意识正是晚清小说观念革命的理论先导。

小说真正摆脱史的枷锁是在戊戌变法之后。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8年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在文中借翻译和创作政治小说,通过将小说和政治捆绑,来宣扬救国。他甚至编造谎言来提升小说的地位,说欧洲各国政治改革的成功都有赖于小说,说日本以小说兴国,实现明治维新,使国家富强。他认为小说的社会作用简直无所不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说。”任何方面只要想

革新,就需先更新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在他看来,小说的作用有多大,小说的社会地位就有多高。至此,小说地位得以改变,“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蔡景康认为,这一著名命题,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明确树立起视小说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独立存在形式的观念,是我国小说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是我国小说理论理念更新和理论自觉的标志^[9]。林纾用他早期的生花妙笔,翻译了一部部象《茶花女》一样的精彩小说,让享有如此高社会地位的小说逐步走进了社会大众的生活。

“五四”新文学时期主张白话文运动。胡适在文学革命之初提出白话文学是文学的正宗,白话小说是文学正宗的重要命题,就其历史意义来说,小说从此真正步入了文学的殿堂,确立了正宗的地位,成为与诗歌、散文、戏剧相提并论的文学四大门类之一。

五 域外小说翻译给读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激起了大众阅读兴趣,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繁荣

中国传统小说的主题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英雄传奇、讲史演义和神魔志怪。晚清之时,通过翻译进入国人视界的外国小说呈现的是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不同的内容、风格和审美情趣,为清末文人和大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给他们带来了许多观念的更新。这些观念包括爱情婚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10]。

域外小说翻译给清末文人和大众呈现了外国小说的精彩和巨大的文学成就,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不意西籍有如此之细腻……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内容新鲜,译笔凄婉而有情致,竟引得平复慨叹:“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让英敛子“灯下阅《茶花女》,有摧魂撼魄之情,万念灰靡。”《茶花女》一时风行海内,不胫而走,以至出现万人空巷、洛阳纸贵之盛况。随着茶花女、福尔摩斯等故事日渐流传开来,翻译小说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受翻译小说的影响,晚清创作小说的题材越来越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梁启超鼓吹小说革新,提升小说地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和创作小说的繁荣,“饮冰子《谈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吾国之新

著新译之小说几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佚名《月月小说·序》)。日本研究清代小说的著名学者搏本照雄先生编纂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7年10月出版)共收集1902—1918年间的创作小说11040件,翻译小说4974件,除去重复的版本,有创作小说7466种,翻译小说2545种。当时除报刊均载有小说外,还创办了约30余种的小说专刊。比较有名的有梁启超1902年主编的《新小说》、李伯元1903年主编的《绣象小说》、吴趼人1906年主编的《月月小说》。此外还有《小说林》、《新新小说》和《小说月报》等。由此足见当时小说翻译与创作的繁荣。

域外小说翻译介绍了外国小说作品,展现了外国小说创作的巨大文学成就。它所展现的外国小说全新的小说观念、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法、灵活多变的叙事角度、多样化的体裁和文学样式等等,成为中国小说家模仿、借鉴、学习的榜样。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都承认域外小说翻译给予了他们启示、引领他们走上文学之路,使中国小说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六 结语

中国小说的形成、发展和现代转型离不开翻译。外汉翻译丰富了汉语语言表达形式,促进了汉语口语化和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为小说创作准备了语言基础。域外小说翻译在小说素材、创作手法、小说观念、叙事角度、小说体裁、小说功能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对中国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现代转型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域外小说翻译介绍了外国小说作品,展现了外国小说创作的巨大文学成就,培育了中国小说市场,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孕育、培养了新一代中国小说家,中国小说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关于翻译对中国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现代转型方面的影响研究不少,但关于这种影响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以及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发展线索的梳理性研究,依然不够,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 [1] 刘宓庆.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44.
- [2] 王克非. 近代翻译对汉语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2(6):458-463.
- [3] 刘祥清. 佛经汉译的历史和作用[J]. 中国科技翻译,2006(3):52-55.
- [4] 史有为.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 上海:上海辞书

- 出版社,2004:173-212.
- [5] 袁 进. 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J]. 社会科学,2008(2):175-179.
- [6] 王 力. 汉语史稿:上、中、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焦亚璐. 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古小说渊源探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专辑):233-237.
- [8] 潘承玉. 中国通俗小说之源:佛家“论议”、“说话”考[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107-113.
- [9] 转引自蔡景康. 从孔子的“小道观”到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试论我国小说观念的转换更新[J]. 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3):15-23.
- [10] 程继红. 论晚清翻译小说的影响[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5):38-43.

On Influences of Translation upon Chinese Fictions

LIU Xiang-q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s-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translation has made the Chinese language more and more expressive and colloquial, and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change from classical to vancular.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s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fictions, which can be found in such factors as preparation of its source materials, richness of its writing skills and genres, change of its ideas and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and improvement of its functions and social position.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ictions has unfolded the great literary wonder and success, and has given birth to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a's novelists, thus bringing Chinese fictions to a brand-new stage.

Key words: translation; fiction; modern transformation